

“六日战争”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

张倩红 宋静静

内容提要 1967年爆发的“六日战争”激活了以色列社会多种变化的因子。战后安全形势的改变、国民自豪感的形成以及社会融合步伐的加快,无疑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构。但是,随之而来的自我意识的膨胀、宗教势力的强大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也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六日战争”充分证明了现代战争的多重性功能与多元化后果,也为研究战争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典型的个案。

关键词 “六日战争” 以色列社会 影响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此起彼伏的枪炮声淹没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人们在关注国家灾难与民族创伤的同时,往往忽略了战争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互动性。克劳塞维茨指出:“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¹ 马克思也称:“战争本身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④ 在对“战争万恶论”与“战争万能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经典作家们充分肯定了战争功能的客观性、双重性和复杂性。纵观 20 世纪以来的中东历史,如果仅把战争的破坏力看做一种短暂的、表层的现象,而从更长远、更深层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不难得出另一种结论:战争不仅仅是用军事语言表达了民族国家的政治需求,而且是“历史季节的标志”,它和人类文化交往、社会演进、国民性格形成以及族群心理变化如影随形。“六日战争”^⑤作为现代中东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战争,国外学者就战争爆发的原因、结果、影响以及大国因素等有过很多著述^⅜;中国学者也发表了一些相关

¹ 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4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7 页。

^⑤ 指 1967 年 6 月 5 日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因历经六天,故称“六日战争”,也因其爆发于 6 月 5 日,又名“六五战争”。

^⅜ 国外学者的主要著述有:伊莎贝拉·基诺里:《超越迪莫纳的狐蝠:六日战争中的苏联核赌博》(Isabella Ginor Foxbats over Dimona: the Soviet Nuclear Gamble in the Six Day War),纽黑文 2007 年版;奈杰尔·阿什顿:《1967—1973 年间的中东冷战:地区冲突与超级大国》(Nigel J. Ashton, The Col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Conflict and the Superpowers 1967—1973),伦敦 2007 年版;摩西·西蒙:《1957—1967 年间的阿拉伯政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六日战争:阿拉伯战略学形成和纳赛尔走向战争》(Moshe Shemesh, Arab Politics,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and the Six-Day War: the Crystallization of Arab Strategy and Nasir's Descent to War, 1957—1967),布赖顿 2008 年版。

文章¹，但总体看来，关于“六日战争”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挖掘还不够。本文以“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国民心理、精神潮流以及族群关系等方面的变化为研究视角，探讨战争与社会演进之间的关系。笔者无意粉饰战争的残暴性，更非否认“大以色列主义”的侵略性，而旨在说明现代战争的多重性社会功能与多元化后果。

一、领土变更与国民安全感的形成

由于巴勒斯坦^④地区特殊的历史，以色列建国前这里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国家实体，巴勒斯坦的归属问题一直是阿以冲突的焦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后，犹太人掀起了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但定居下来的移民人数很有限，到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的时候，巴勒斯坦犹太人口仅占当地总人口的10%左右。英国委任统治期间，犹太移民迅速增长，20年代末达到15.7万，占当地总人口的17.7%。1939年底，犹太人口增加到47.5万，约占当地总人口的30%^④。犹太移民数量的剧增和在此地建立民族家园的举动引起了当地阿拉伯人的恐慌与不安，阿犹武装冲突频繁，巴勒斯坦局势失控，委任统治宣告失败，英国于1947年2月将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会议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即181号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成立独立的阿拉伯国与犹太国，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由联合国管理。阿拉伯国领土包括西加利利、除耶路撒冷外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从阿什杜德（Ashdod）到埃及西奈边界的加沙沿海平原，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0%。犹太国领土包括东加利利、从阿卡（Acre）南部到现在阿什杜德港口南部之间宽约7公里的沿海平原、除加沙沿海平原和西北部分地区外的整个内格夫地区，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60%^Ⅳ。犹太人把分治决议看做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1948年5月14日英国宣布结束委任统治的当天，迅速在特拉维夫宣布以色列国建立，然而对分治决议极度愤怒的阿拉伯世界决定以武力解决问题。

在1948年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大约6000平方公里的阿拉伯国土地，其陆上总控制面积达到20255平方公里^Ⅴ。1956年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虽然没有造成领土变更，但

¹ 中国学者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张煜：《从第三次中东战争看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5期；吴颖：《“六日战争”后以色列耶路撒冷统治政策研究（1967—1992）》，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冯帅鹏：《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地缘政治学探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5期；高颂：《“六日战争”的反思与启迪》，《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徐硕：《美苏在中东的争夺与第三次中东战争（1961—1969）》，《财经界（下旬刊）》2008年第2期。

④ 巴勒斯坦（Palestine）古称迦南地（Canaan），犹太人曾在此建立希伯来王国。今“巴勒斯坦”这个名字起源于希伯来语“Peleshet”。“Phleshet”是希伯来人对当时迦南地另一民族“腓力斯丁”（又称非利士）的称呼，意为“外来者”。在希腊文献中，希罗多德（Herodotus）称“巴勒斯坦”为“腓力斯齐亚”（the Philistine Syria），“the Philistine Syria”后被缩短转写为“Palaistine”。犹太哲学家斐洛（Philo）也认为“Palaistine”就是《圣经》中提到的迦南。后来罗马人根据希腊语将此地名转写成拉丁语的“Philistin”和“Palestin”，英语为“Philistine”和“Palestine”，汉语分别译为“腓力斯丁”、“巴勒斯坦”。伊斯兰教兴起后，许多阿拉伯人定居此地，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他们用“Filastin”来称呼此地。但犹太人一直称巴勒斯坦地区为“Eretz Yisrael”，意为“以色列地”，在英文中通常用“the Land of Israel”作对应表述。参见《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Judaica*）第13卷，耶路撒冷1971年版，“Palestine”词条，第29页。

④ 莱斯利·斯坦因：《梦想实现：现代以色列的崛起》（*Leslie Stein The Hope Fulfilled: The Rise of Modern Israel*），伦敦2003年版，第197页。

Ⅳ 《犹太百科全书》第13卷，第38页。

Ⅴ 《犹太百科全书》第9卷，第569页。

却加剧了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国的冲突与矛盾。“六日战争”前,阿拉伯世界仍然宣称要将犹太人赶进地中海,并不断引进苏联的军事武器。同时,战前以色列国的土地也缺乏地缘安全¹,这表现在北部地区的叙以冲突不断,叙利亚不断炮击叙以边界的以色列定居点;中部地区,约旦炮兵仍然威胁着以色列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沿海平原地带;南部的埃及空军在西奈半岛虎视眈眈,并宣称6分钟之内就可以轰炸特拉维夫;而耶路撒冷仍被约旦、以色列分割^④;巴勒斯坦游击队也在叙利亚的支持下不断越境袭击以色列定居点。安全感的长期缺失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色列出现倒移民现象,相当多的中产阶级家庭悄悄移民到美国等发达国家^⑤。这种现象震撼了以色列领导人,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是把以色列建设成为世界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为了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改变不利的地缘局势,以色列国防军于1967年6月5日发动针对埃及、约旦、叙利亚的军事进攻,到6月11日战争结束时摧毁了埃及、叙利亚、约旦的空军力量,并夺得68 589平方公里的阿拉伯领土。其中戈兰高地1150平方公里、约旦河西岸5878平方公里、加沙地带363平方公里、西奈半岛61 198平方公里,以色列总控制面积达到89 359平方公里^{1/4},是原有国土面积的4倍。领土扩张使以色列的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南边,以色列军队驻守苏伊士运河西岸,离开罗不足110公里,西奈沙漠成为以埃之间的一个缓冲带;在东面,以色列控制区离阿曼不足49公里,消除了约旦对以色列沿海平原和耶路撒冷的威胁;在北面,以色列控制了戈兰高地的制高点,离大马士革不足60公里,并在高地上建立战略预警设施和监视系统,大马士革以西的地区几乎全都处在以色列军队的监控之下。战前叙利亚对以色列北加利利地区的威胁被战后以色列炮兵和装甲部队对大马士革的威胁所代替^{1/2}。安全度的提升使以色列倒移民现象消失,战前许多移居国外的以色列人返回国内定居,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高潮。1968—1973年间以色列社会共接纳了25万犹太移民,其中来自于苏联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移民占移民总数的一半还多^{3/4}。

为了进一步巩固安全局势,以色列政府在新占领土上建立了大批具有战略价值的定居点。截至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以色列在戈兰高地上建立了16个定居点^⑥;在约旦河裂谷地区建立了21个定居点^⑦;在拉法(Rafiah)地区建立了12个定居点^⑧;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建立了16个定居点^⑨。这些定居点不仅可以监视周围地区的形势变化,收集战略情报,为以色列政府提供决策依据,而且可以在战争中有效地延缓敌军的进攻步伐,为以色列军队的反击赢得宝贵的时间。

总之,国土变更既使以色列国有了战略回旋余地,又为公众建立了心理上的安全屏障,国民集体

¹ 根据分治决议,犹太国整体呈一倒置的烙铁状,三部分领土交界处仅靠点相连接,有被计划中的阿拉伯国拦腰截断的危险。虽然经过第一次中东战争情况有所好转,但以色列国土仍然缺乏战略纵深,这种领土分布状况使一些犹太人深感忧虑。

④ 田上四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东战争全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⑤ 阿鲁恩·布雷格曼:《以色列史》(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纽约2003年版,第103页。

^{1/4} 《犹太百科全书》第9卷,第569页。

^{1/2} 哈伊姆·赫佐克:《阿以战争:中东地区的战争与和平》(Chaim Herzog, *The Arab-Israeli Wars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伦敦1982年版,第189页。阿鲁恩·布雷格曼:《以色列史》,第123页。

^{3/4} 关于1968—1973年间以色列移民来源地、具体人数参见《以色列政府2007年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 2007*), No. 58 Subject 4—Table No. 2, No. 4 http://www.cbs.gov.il/reader/shnaton/templ_shnaton_e.htm?num_tab=s04_02&Year=2007,下载于2008-09-25。

⑥ 哈伊姆·格瓦蒂著,何大明译:《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1880—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

⑦ 哈伊姆·格瓦蒂著,何大明译:《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1880—1980年》,第412页。

⑧ 哈伊姆·格瓦蒂著,何大明译:《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1880—1980年》,第415页。

¹⁰ 马丁·吉尔伯特:《阿以冲突图说》(Martin Gilbert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ts History in Maps*),伦敦1979年版,第76页。

安全感得以形成。以色列政府也开始削减军队及军费开支,1973年夏天,国防部宣布把义务兵役的时间从36个月缩减至33个月,预备役由1年60天缩减至30天。国防费用也由1970年的占国家总预算的40%降低到1973年的32%,并计划到1977年国防费用降低到低于国家总预算的14.6%的水平¹。

二、国民性格与精神潮流的改变

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体现,其内容包括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心理特征、国民情感、道德品质,等等。犹太文化作为一种博大精深而又极富感染力的精神遗产,通过文化环境化与文化人格化两个重要环节塑造了犹太国民性。所不同的是,与其他民族相比,犹太民族性格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Bar Kokhba)起义失败后,犹太人开始流亡到世界各地。作为客体的犹太民族在与所在国主体民族交往时往往处于劣势和从属地位。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滋养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在实现其民族理想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批判传统犹太教戒律、与世隔绝的犹太生活及非犹太社会的敌视态度对犹太人格的严重扭曲。赫茨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生活在隔都中的犹太人养成了一种自私的品性,“表现出了受到不公正的裁决而长期服刑的犯人的特点”。犹太人勇武、刚毅及自尊的品质“已经为压迫所腐蚀”。犹太人虽然在法律条文上获得了解放,但他们的精神与人格并没有解放,冷漠、失落、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一直笼罩着他们。

如果说上述现象代表了散居犹太人性格弱点的话,那么,建国后以色列在短短半个世纪中所获得的如梦境般的成功——军事上的成功、经济上的成功及社会发展上的成功,唤起了犹太人的自信与激情,一种新的国民心理也随之而生。许多人不再懦弱、压抑、忍耐,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强悍、骄横与急躁。外界舆论不再把他们描述成“失去阳刚气质与战斗能力的软弱之民”;阿拉伯人也不敢再嘲笑他们是“天生的懦夫”、“死人的孩子”。以色列人被称为“中东的普鲁士人”,他们把以色列的成功建国视为天国创造的一个奇迹;把以色列国的强大看做是一个以弱胜强的典范;把“六日战争”看做是古典民族英雄主义演绎的现代神话。“六日战争”后,这种新国民性格表现得更加明显,以色列学者耶胡沙法特·哈卡比在谈到1967年战争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时深有感触地说:“战争的结果超出了一切希望。于是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能够达到巨大的民族目标,为什么要满足少许东西呢?于是目标扩大了;以色列人的自我形象膨胀起来了;一度可以忍受的旧边界变得守不住了。精神潮流变了,这普遍地影响到生活质量。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应当重视的国家,那么使这个国家变得伟大的公民,毕竟也是伟大的,因此,他们应当拿高薪,过高水平的生活。”^④

伴随着国民心理的变化,以色列犹太人的精神潮流与生活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表现为集体主义观念淡化、个人主义思想蔓延。在长达1800年的流散生活中,历史的波折、世事的磨难,使这个饱经离散之苦的民族更为真切地顿悟到群体的至上与伟大。群体精神已成为犹太人求得生

¹ 马丁·吉尔伯特:《以色列史》(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伦敦1998年版,第423—424页。

^④ 劳伦斯·迈耶:《今日以色列》,第46页。

存与发展的传世之宝、“文化疆界”的基本内涵和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作为群体精神象征的集体主义也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社会理想。建国初期,以基布兹¹为代表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平等主义思想在以色列社会极为流行。但“六日战争”后,城市化和中产阶级的兴起导致了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削减了价值观念中的社会主义和平等意识,公有制成分降低。一些基布兹成员收入出现差异,在繁荣与富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基布兹青年很多人选择离开基布兹,以寻求个性主义的生活方式。一位在建国前极为活跃的女性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候(建国初期)跟现在不同的是,人们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而现在(‘六日战争’后)他们是从‘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④个人主义的流行在作为思想文化载体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也有所印证,如第一代以色列本土作家多注重在战争、复国、重建家园等重大时代背景中烘托人物性格,其作品多以基布兹和独立战争为背景,充满了战争阴影、社会责任感与英雄主义。而以阿摩司·奥兹为代表的第二代本土作家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作品中,关注点已转向探索人物心灵世界与内在生活空间,第一代本土作家所关注的题材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其次,国民劳动意识淡化、懈怠情绪上升。以色列建国前,在犹太复国主义左翼思想家阿龙·大卫·戈登的影响下,劳动被看做是犹太民族恢复健全心智、实现人与宇宙合一及民族复兴的基本手段,以劳动来塑造自我成为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价值取向。犹太移民们高唱着质朴感人的希伯来歌曲——“我们来改造这块土地,同时也被它所改造”,以忘我的工作热情弘扬求实进取的民族精神。建国后,这种新的民族精神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激励着人们走过建国初期的艰难岁月。

然而,“六日战争”以后,大量外援像潮水一样涌入这个国家,仅在战争爆发以后的六个月内以色列就收到了60亿美元的世界犹太人的捐款^⑤,美国政府给以色列的捐助也激增^{1/4},轻而易举获得了消解以色列犹太人原有的忧患意识与进取精神。突如其来的成就感也使他们的自我价值判断急剧膨胀,人性中固有的懈怠情绪复苏。许多人不愿意再从事艰苦的生产劳动,阿拉伯人成了基布兹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虽然基布兹领导人极力纠正这一违反基布兹“自我劳动”原则的现象,但雇佣阿拉伯人从事农业生产已成为以色列基布兹社会的事实。他们昔日的创业精神也明显淡化。据说有一批越南难民在以色列总工会下属的企业工作,由于工作太卖力气而受到以色列工友的警告,威胁他们不要干得太多,以免自讨苦吃。这些越南人知趣地放慢工作速度,双方和好如初。一些以色列人抱怨说:“我们过去有过一种说法:就连不可能的事到了这里也是可能的,现在我们说,就连可能的事(到了这里)也成为不可能的了。”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位撰稿人在戈兰高地参观时,一位以军士兵在谈到战后以色列青年心理变化时这样说道:“对大多数年轻人来

¹ 基布兹(Kibbutzim 希伯来语,译为集体农庄)是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后建立的农业合作组织,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成为基本的农业组织形式。基布兹内部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成员共同劳动,自愿、平等、民主、财产共有是它的基本原则。在“六日战争”前对以色列社会影响较大,战后由于各种原因基布兹影响下降。详见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基布兹”词条,第585—586页。

^④ 劳伦斯·迈耶:《今日以色列》,第46页。

^⑤ 阿鲁恩·布雷格曼:《以色列史》,第124页。

^{1/4} 1949—1965年,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年均援助为6300万美元;1966—1970年,对以色列年均援助为1.02亿美元;1971年后高达20多亿美元。资料来源于:克莱德·R.马克:《美国对以色列援助》(Clyde R. Mark, *Israel: U.S. Foreign Assistance*), <http://ftp.fas.org/spp/crs/inileast/IB85066.pdf> 2005-04-26

说,古老的创业梦想正在消失,他们想要成为现代国家而非创业国家的组成部分。”¹

再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物质享受。“六日战争”有力地促进了以色列经济的发展。国防需求促进了经济复苏,扩大了就业机会,以色列经济进入发展期。1967—1972年,以色列经济的年增长率为13%;1968—1972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3%,高于1948—1966年的10.3%,其中1971年为11.1%,1972年为12.6%^④。在国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关注于眼前利益,追求物质享受。“一些以色列人生活奢侈,他们驾驶着宽敞的汽车、穿着时髦、尽情挥霍,追求着一种与以色列经济能力及国民生活状况不相称的外来生活方式。”^④不仅如此,以色列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也开始腐化。例如,战后,政府为了防备埃及军队进犯,保护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沿线的以色列士兵免遭炮击,决定修筑巴列夫防线,然而在修筑巴列夫防线和西奈其他军事工程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一个新的军事百万富翁阶层,这些人通过国家的安全投资而发财,在特拉维夫北面的赫茨利亚(Herzliya)和佩托阿(Petah)大量修建豪华住宅。昔日的创业精神与忧患意识逐渐成为过眼烟云,一些以色列人开始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迷失方向。

三、宗教势力上升,民族主义情绪强化

在数千年的犹太历史中,犹太教逐渐成为构筑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在大流散时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犹太教兼具民族文化传承载体的功能,保证了犹太人在失去构成民族历史的关键要素——共同疆域的条件下,创造了流而不散的历史文化奇迹。犹太教早已成为犹太人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早期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主流派的梦想是把以色列建成一个世俗化的民族家园。西奥多·赫茨尔在《犹太国》中写道:“军队和教士不得干预授予他们荣誉的国家的行政管理事物。”^Ⅱ第一任总统魏茨曼也指出:“我认为我们有责任高度尊重社团的宗教感情,但国家不能把宗教作为治国的主要准则而将时钟拨慢。宗教应放在犹太会堂和需要它的家庭里,不应控制国家机关。”^Ⅲ以色列《独立宣言》也明确指出:以色列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都可享受社会和政治平等,以色列是一个世俗国家而非神权国家。建国后,工党“马帕伊”政府提出国家主义^Ⅳ,把构建民族国家作为长期的目标,同时在社会生活中推行一系列世俗化政策,减弱宗教势力的影响。“六日战争”前,宗教势力只拥有成立国立或私立宗教学校和决定公民婚姻的权力,对政府的内外政策采取温和态度,基本上不干预世俗事务。

战后,在一些世俗青年醉心于个人主义的同时,以色列社会也出现了向传统复归的潮流。“以色列建国后的前20年,许多人把美国文化作为现代国民文化的楷模在深层次上进行仿效,试图用美国

¹ 约瑟夫·贾奇:《以色列:第七天》,转引自王晓德:《“美国化”与以色列向现代消费社会的转变——一种文化视角的探讨》,《西亚非洲》2008年第1期。

^④ 阿鲁恩·布雷格曼:《以色列史》,第137页。

^④ 果尔达·梅厄:《梅厄自传》(Golda Meir My Life),纽约1975年版,第396页。

^Ⅱ 西奥多·赫茨尔著,肖宪译:《犹太国》,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2页。

^Ⅲ 劳伦斯·迈耶:《今日以色列》,第355页。

^Ⅳ 关于“国家主义”本·古里安使用了“Mamlakhtit”,它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kingdom”、“state of freedom”、“commonwealth”等,即英语中的“statism”。主要内容包括军队国家化、教育体制统一化、国家干预经济等方面。参见张倩红:《以色列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247页。

化来掩饰心中的自卑与经过大屠杀后的无奈状态。他们吸收、采纳最新的美国文化事物,使其扩散速度之快甚至超过美国社会本身,以色列俨然主人一般的、甚至比美国人表现得更美国化。”¹但是,“六日战争”以后,犹太民族自豪感勃发,大量希伯来语作品出现,传统文化复兴,许多犹太人开始给自己的孩子起希伯来名字。一些人走进久违的会堂过起了宗教生活,就读宗教学校的人数也普遍增多,整个社会宗教热情上升。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对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领土的占领为宗教势力的弥赛亚^④学说提供了依据,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并在民众中产生影响;二是战争的残酷性使一些人转向宗教,以求得信仰虔敬与心灵宁静。宗教领袖与宗教政党在世俗犹太人中的影响增加,先后取得了诸如修改妇女服兵役的法律、禁止妇女人工流产、严格执行安息日规定等一系列权力,甚至在定居点问题上严重干预政府决策。

随着宗教势力的复兴,以色列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膨胀。议会于1967年6月27日通过东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与西耶路撒冷合并的法案,使犹太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潮。此后,在处理阿以关系问题上,以色列政府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使用武力的倾向增强。1967年之前,以色列对阿拉伯反以组织的行动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政策,多为遭受攻击后的被动反应。但1968年以后采取了一项新的“积极自卫”政策,无视其他国家主权与国际惯例,对凡是有巴勒斯坦反以组织存在的国家展开越境袭击,给阿拉伯人造成巨大灾难。例如,1968年12月当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客机在雅典遭巴勒斯坦突击队员袭击后,以色列随后炸毁了贝鲁特国际机场上属于黎巴嫩航空公司的13架民用客机^(四)。

与此同时,一般民众的鹰派倾向也在加强。根据1968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关于被占领土归属问题回答“只归还小部分”和“无意归还”的比例为(不包括耶路撒冷):戈兰高地99%,沙姆沙伊赫93%,约旦河西岸91%,加沙地带85%,西奈半岛57%^{1/4},其中比例最低的西奈半岛也超过了一半。同时民间出现了诸如“信仰者集团”^{1/2}(Gush Emunim,意为“the Bloc of the Faith”)等民族极端主义团体,该组织不顾工党政府的反对与国际舆论的谴责,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了大批定居点,而且

¹ 乌齐·雷布胡恩、哈伊姆·I·维克斯曼:《以色列的美国化——一份人口学、文化及政治意义上的评估报告》(Uzi Rebhun and Chaim I. Waxma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Israel—A Demograph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Evaluation*),《以色列研究》,本-古里安大学2000年春季版。

^④ “弥赛亚”(Messiah)源于希伯来文,原意为“受膏者”,即“上帝的派遣者”。犹太人亡国之后,他们传说上帝终将重新派遣一名出身于大卫王世系的“受膏者”,带领流散的犹太人返回故土并复兴犹太国,弥赛亚遂成为犹太人所盼望的“复国救主”的专称。犹太教的“弥赛亚学说”主要内涵就是“复国”与“救赎”,虔诚的犹太教徒们认为,现代以色列国虽然在1948年建立,但是作为古希伯来王国重要组成部分的犹地亚(Judea)和撒玛利亚(Samaria)(即约旦河西岸地区)、耶路撒冷仍游离于以色列领土之外,因此以色列国的建立只是标志着犹太民族救赎的开始,只有当犹地亚、撒玛利亚地区和耶路撒冷都归以色列国统治时,才是弥赛亚的真正降临和上帝救赎的完成。他们把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地区和耶路撒冷的占领,看做是上帝允诺犹太人统治《圣经》中的以色列地的诺言在现代的应验,是以色列民族复兴的标志。参见《犹太百科全书》第11卷,“Messiah”词条,第1407—1408页。

^(四) 亨利·卡坦著,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1页。

^{1/4} L. 古特曼:《以色列公众、和平与领土:萨达特主动的影响》,耶路撒冷1978年英文版,转引自阎瑞松:《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1/2} 信仰者集团是一个具有强烈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右翼集团,它以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为其主要意识形态,精神领袖为小库克拉比(Zvi Yehudah Kook, 1881—1982)。核心理念为Hinahah(综合了定居与弥赛亚主义),要求犹太人从宗教义务出发回归以色列地定居。战后,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了大批定居点,并强烈反对以色列政府撤出在1967年战争中所占领的任何一部分阿拉伯领土,成为中东和平的逆流。参见汪舒明、缪开金:《信仰者集团崛起及其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西亚非洲》2006年第6期。

追随者越来越多,导致了大批阿拉伯人流离失所。此后,代表以色列民族主义势力的加哈尔(Gahal)、利库德集团¹(Likud B'be)力量也不断壮大,以全国宗教党为代表的宗教势力与右翼民族主义势力联合,整个社会趋于右倾与保守。

四、社会融合步伐加快

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第一代领导人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所有公民平等相待的国家。但是不同社会团体面临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就业机会及教育环境,致使以色列各社团间矛盾加深,社会分裂趋势凸显。

“六日战争”前,以色列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族群的整合,东方犹太人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④之间的冲突是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主要矛盾。建国前及20世纪50年代大量涌入的东方犹太人虽然占以色列总人口的55%—60%,但他们所分享的政治权利却极为有限,在国会、犹太工人总工会、大学和教育机构中居少数,并且遭到以“熔炉政策”^⑤为代表的文化同化政策的压力,生活水准也明显低于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团。整个东方犹太社团处于一种被强制改造的压抑状态,这使他们与在以色列社会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团存在着矛盾。

“六日战争”中,拼杀在第一线的东方犹太人用鲜血与生命洗刷了被称为“寄生者”的耻辱,赢得了阿什肯纳兹人的认可与尊重。再加上希伯来语的广泛推广,战后东方犹太社团与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团间融合的步伐明显加快。在文化领域,以色列政府开始承认犹太文化多元性的现实,逐步调整自己的文化政策,对待东方犹太文化不再采取以往的改造与同化政策,鼓励多元文化并存。以色列文化由50年代欧洲风格一枝独秀转为阿什肯纳兹文化与东方犹太文化和谐共处,一些优秀的东方歌曲与民间舞蹈也受到越来越多阿什肯纳兹人的欢迎^Ⅲ,社会出现了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

在社会经济领域,东方犹太人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社会地位随之上升。东方犹太人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通婚率从1955年的11.8%上升到1975年的19.2%。1967—1977年,受过13年以

¹ 1965年4月,自由党与自由运动联手组成加哈尔集团(Gahal意为“统一”,是“自由运动与自由党集团”的希伯来文缩写),1973年9月第八届议会选举前夕,加哈尔集团、大以色列运动、国家党和自由中心合并成利库德集团(“利库德”在希伯来语中即“团结”),至此以色列政坛右翼民族主义政党联盟形成,并于1977年上台执政。参见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利库德集团”词条,第302—303页。

^④ 关于以色列国内犹太人口构成的研究较为薄弱,一般认为,以色列犹太人分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塞法尔迪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三种。东方犹太人(Mizrahim)泛指来源于东方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塞法尔迪犹太人(Sephardim)主要是指西班牙、葡萄牙的犹太人及其后裔。其实,生活在土耳其与西亚、北非等地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与东方犹太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异,许多以色列人把他们看做一个社团。但塞法尔迪犹太人深切怀念自己祖先在西班牙的光耀时光,极力强调其独特性。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m)最早出现在14世纪的文献中,是对居住在日耳曼地区的犹太人的称谓,具体来说“Ashkenazim”特指在法国北部、德国和斯拉夫地区形成的犹太文化共同体,使用意第绪语是其最典型的特征。散居在欧洲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在外表上与阿什肯纳兹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但二者生活方式、希伯来语发音、宗教礼仪、律法传统上区别较大。

^⑤ 建国后,大批犹太人由于各种原因从世界各地移居以色列。但是近两千年的流散史使各地犹太人形成了不同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心理,当时以色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实现社会的整合。为了实现社会融合,以色列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强制要求移民抛弃原来的文化传统,以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阿什肯纳兹文化传统为标准,重新塑造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此类加速移民融入以色列社会的政策被总称为“熔炉政策”,其本意是为了加快民族融合,但由于忽视了当时犹太社团的具体情况,遭到了很多移民社团的反对。

^Ⅲ 唐纳·罗森塔尔:《以色列人:不寻常土地上的普通人》(Dona Rosenthal *The Israelis Ordinary People in an Extraordinary Land*),纽约2003年版,第122页。

上教育的东方犹太人的比例由 3.6% 上升到 7.7%，专业人员的比例由 7.3% 上升到 10.1%，年收入在 1000 以镑以上的城市雇家家庭从 6.7% 上升到 60.7%¹。70 年代初以来，以色列政府有意识地改善东方犹太人的处境。在全国较大的城市里，政府统计数字表明，1967—1979 年间东方犹太裔学生在 14—17 岁年龄组内所占的百分比和他们入学率之间的差距已从 14% 缩小到 6%，欧美裔和东方裔以色列人在教育上的差距正在被消灭^④。

在政治领域，东方犹太人的影响也在逐步增长。在地方政府中，1950 年仅有 13% 的东方犹太人担任议员，1% 的东方犹太人担任市长或议长，而到了 1973 年这一比例分别上升到 44% 和 33%^④。至 1973 年，共有 3 位东方犹太人担任过内阁部长，同年议会中有 15 名东方犹太人议员。特别是出身于东方塞法尔迪家族的伊扎克·纳冯 (Yitzhak Navon) 在 1982 年当选为以色列总统，更明显地体现了东方犹太社团与阿什肯纳兹社团间卓有成效的社会融合。

与此同时，以色列犹太人对国内阿拉伯人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时，以色列国内有 15.6 万阿拉伯人，“六日战争”前以色列大约有 40 万阿拉伯人^{1/4}。很多犹太人把身边的阿拉伯人看做是潜在的“第五纵队”，以色列政府也对其实行军政府统治，但以色列阿拉伯人在战争危机到来之际的表现却大大出乎了犹太人的意料。一些德鲁兹青年走上特拉维夫街头游行，要求加入以色列军队同敌国作战^{1/2}。在战争中，以色列阿拉伯人面对周围阿拉伯国家电台不断要求其发动反以起义的鼓动，依然保持了对以色列国家的忠诚，有些阿拉伯人还作为后备役军人参加维护国内秩序的任务^{3/4}。他们以实际行动改变了许多犹太人的看法，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战后更多的以色列犹太人愿意与国内阿拉伯人交往，以色列国内的族群关系有了很大改善。1967—1977 年，工党对阿拉伯人实行政治统治，阿拉伯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有所改善。1974 年，阿拉伯乡镇长委员会 (The Committee of Arab Mayors and Municipal Council Chairmen) 成立，以色列政府期望其在沟通以色列阿拉伯社团和政府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75 年，以色列共产党成员、阿拉伯诗人陶菲克·齐亚德 (Tawfiq Ziad) 当选为拿撒勒市市长，标志着阿拉伯人在政治上取得突破性进展^⑧。战后，以色列政府也对阿拉伯人居住区展开了一些援助，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政府已经对以色列阿拉伯人居住区投入了 8500 万以镑；第二个五年计划继续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居住区投资 1.15 亿以镑来改善阿拉伯人的社会发展水平。犹太总工会中阿拉伯会员人数也由 1955 年的 6000 人上升到 1969 年的 5 万人，占到阿拉伯劳工数目的一半⁽⁴⁾，许多阿拉伯劳工的利益得到保护。20 世纪 70 年代，以色列政府又为北部地区的贝都因部落新建了 20 个设施完善的定居点，80 年代又为南部的贝都因部落新建 7 个同样

¹ A. 塞拉、Y. 依沙伊：《以色列和平的交战国 (1967—1969)》，麦克米兰公司 1986 年版，转引自阎瑞松：《以色列政治》，第 110 页。

^④ 劳伦斯·迈耶：《今日以色列》，第 179 页。

^④ 纳达夫·萨夫兰：《以色列：受困的同盟》(Nadav Safran *Israel: the Embattled Ally*)，剑桥 1981 年版，第 91 页。

^{1/4} 尼里·亚非、多利·塔尔：《以色列阿拉伯人》(Nurit Yaffe and Dorit Tal *The Arab Population in Israel*)，《统计》(Statistika) 2002 年 11 月第 27 期，<http://www.cbs.gov.il/statistical/arabju.pdf>

^{1/2} 沃尔特·拉克尔：《通向 1967 年战争之路》(Walter Laqueur *The Road to War 1967*)，伦敦 1968 年版，第 131 页。

^{3/4} 米切尔·G. 巴德：《事实与谎言：一本有关阿以冲突的简明记录》(Mitchell G. Bard *Myths and Facts: a Concise Record of the Arab-Israel Conflict*)，华盛顿 1992 年版，第 207 页。

^⑧ *Arab citizens of Israel*,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ab_citizens_of_Israel 2008-09-28.

⁽⁴⁾ 《犹太百科全书》第 9 卷，第 1027—1028 页。

的新定居点¹。越来越多的以色列阿拉伯青年掌握了希伯来语,他们能熟练阅读犹太人的报纸与书刊,其中有些人对犹太文化与宗教的了解甚至超过了一些世俗犹太人,越来越多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被犹太社会所接纳。“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国内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相互融合的趋势一直延续到80年代,1987年爆发的“因提法达”^④最终打断了社会整合、民族相融的进程。

魏茨曼曾经说过,“新生活的第一个胚芽将从战争的悲凉与痛苦中产生”,这句话仿佛是对40多年后发生的“六日战争”的预言。突如其来的战争成果使以色列人的国民自豪感勃然而发,也催发了以宗教为主要载体的传统主义以及民族英雄主义情结的复归,从而为这一新生民族国家增添了不同寻常的活力与热情。然而,随之而来的理想主义热情的消减与精神潮流的蜕变,特别是自我意识膨胀所催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对未来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六日战争”充分证明了战争对社会的影响是多元化、深层的,是建构与解构同时并存的。

[本文作者张倩红,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静静,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犹太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开封 475001]

(责任编辑:马新民)

¹ 尼里·亚非、多利·塔尔:《以色列阿拉伯人》, <http://www.dss.gov.il/statistical/arabju.pdf>

^④ “因提法达”为阿拉伯语“intifada”的音译,意为“摆脱”、“驱逐”。特指1987年以后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统治的大起义。

SUMMARIES OF ARTICLES

On the Impact of Wars on Russian Development Road

Yao Hai

The nation in Russia was always established by military powers. During Moscow Dukedom times, the frequent wars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bilization society, wartime system, autocracy and slavery. But from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18th century, wars against foreign countries forced the Tsar power to introduce western culture to strengthen military and economic power, and thus promoted the Europeanization of Russia. Since 19th century, several wars against foreign countries exerted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choice of Russian development road, in which the traditional goal of establishing the military power state and pursuing the Empire interest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A Study on Japanese Disarmaments Campaign in 1920s

Zhu Shuguang

Modern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constantly adhering to the policy of “enriching the country and strengthening the military”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 army in 1871. It has placed army expansion and war preparation as its top priority, which facilitates its military strength to achieve that level of western power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o as to challenge their hegemony directly. However, Japanese armaments expansion simply did not rise straightly due to the restraints at home and abroad. A considerable disarmaments campaign appeared in the 1920s’ Japan. This was contribut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as the following: the rise of domestic peaceful antiwar forces after World War I, the high dependence of Japanese economy o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 and Britain’s pursuit of a new power balance in Far East.

The Impact of “Six-Day-War” on Israeli Society

Zhang Qianhong Song Jingjing

“Six-Day War” in 1967 has activated various change factors in Israeli society.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state was promoted by the change of postwar security situatio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pride, as well as the accelerating social integration. However, with the appearance of self-awareness, the increase of religious influence, as well as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mood, have had the noticeably negative effect on Israeli

society. In a word, the “Six-Day War” has not only fully proven modern warfare’s multiple functions and the multiple consequences, but also has provided a model case for the research of war-and-society relations.

The US Middle East Policy in 1950s— From Omega Plan to the Birth of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Lan Lan

As the US Middle East policy in the 1950s,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aimed to integrate some Arab states into its coalition of global containment, fend off Soviet penet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its Middle East policies thereafter.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was formed because the Omega Plan could not tackle the problems of the Middle East effectively. It is an open clarification of the Omega Plan, which emphasizes the continuity of the US Middle East policies.

An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of Nixon Administration

Xia Zhengwei Xu Anchao

During Richard Nixon’s presidency, environmental issue became one of the major themes of American diplomacy. Through such frameworks as NATO, OECD, U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ixon Administration adopted a series of diplomatic actions focusing on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protection and pollution harnessing. Nixon’s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reflected his pioneering diplomatic concept and concrete action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executed the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ahead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herefore the Americans took an advantaged position in the field. Henceforth,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field was promoted and reached its zenith in early 1970s. However, mainly focusing on Americ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situations as well as realistic national interests, Nixon’s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couldn’t help make environment diplomatic policies from the angl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ice Problem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State Regulation

Chai B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problem and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long-term regulation of price resulted from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the 16th century. By numerous royal proclamations, the Tudor State reinforced price control and gained certain positive effects. However, restricted by som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its actual effect is quite limited.